

2.2.3	国内外研究特点	35
2.3	核心研究话题	35
2.3.1	以培育译者能力为导向的翻译课程设置研究	35
2.3.2	以提升就业能力为导向的翻译课程设置研究	36
2.3.3	以提升综合能力为导向的跨学科课程设置研究	37
2.4	研究案例分析	41
2.4.1	翻译培训课程设置研究	41
2.4.2	职业化翻译课程设置研究	42
2.4.3	本地化翻译课程设置研究	44
2.4.4	个性化翻译课程设置研究	45
2.4.5	翻译研究方法论课程设置研究	47
2.5	翻译课程设置研究展望	48
2.5.1	加强跨学科研究	48
2.5.2	加深理论研究	49
2.5.3	拓展关联研究	50
2.5.4	增加研究的智能化维度	50
2.6	小结	51
 第三章 翻译教材研究		 53
<hr/>		
3.1	引言	53
3.2	研究概述	53
3.2.1	国外研究概述	54
3.2.2	国内研究概述	56
3.2.3	国内外研究特点	62
3.3	核心研究话题	62
3.3.1	英语专业的翻译教材研究	63

3.3.2	翻译专业系列教材研究	64
3.3.3	口译教材研究	65
3.3.4	翻译技术教材研究	66
3.4	研究案例分析	68
3.4.1	教材编写体系理论研究	68
3.4.2	专题性教材应用研究	69
3.4.3	翻译教材的定量研究	71
3.4.4	翻译教材现状研究	72
3.4.5	翻译教材比较研究	73
3.5	翻译教材研究展望	75
3.5.1	加强理论研究和宏观框架建设	75
3.5.2	注重教材与教学的关联研究	76
3.5.3	开展智能化翻译教材研究	76
3.5.4	推动教材评估的实证研究	77
3.6	小结	78
第四章 翻译教学方法研究		79
4.1	引言	79
4.2	研究概述	80
4.2.1	国外研究概述	80
4.2.2	国内研究概述	84
4.2.3	国内外研究特点	86
4.3	核心研究话题	87
4.3.1	基于语言和文本的翻译教学方法研究	87
4.3.2	以能力培养为中心的翻译教学方法研究	89
4.3.3	PBL 翻译教学方法研究	90

4.3.4	项目化翻译教学方法研究	92
4.4	研究案例分析	94
4.4.1	培养翻译能力的教学方法研究	94
4.4.2	活用平行文本进行教学的研究	95
4.4.3	使用情景学习的教学方法研究	96
4.4.4	翻译理论教学的“翻转课堂”研究	97
4.4.5	翻译技术教学方法实证研究	98
4.5	翻译教学方法研究展望	99
4.5.1	深化理论基础研究	99
4.5.2	扩大研究范围	100
4.5.3	加强实证研究	100
4.5.4	强化汉译外教学方法的研究	101
4.5.5	拓展中外翻译教学方法对比研究	101
4.6	小结	102
第五章 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		103
<hr/>		
5.1	引言	103
5.2	研究概述	105
5.2.1	国外研究概述	105
5.2.2	国内研究概述	107
5.2.3	国内外研究特点	110
5.3	核心研究话题	110
5.3.1	翻译测试设计构念	111
5.3.2	翻译测试能力框架	112
5.3.3	翻译测试设计质量检验	114
5.3.4	翻译测试评估模式	116

5.4	研究案例分析	118
5.4.1	口译评估实证研究	118
5.4.2	翻译测试构念研究	119
5.4.3	语料库工具评估研究	120
5.4.4	反拨效应质性研究	122
5.4.5	应用型文本翻译质量评估研究	123
5.5	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展望	124
5.5.1	借鉴语言测试的研究成果	124
5.5.2	定性定量研究结合	125
5.5.3	加强跨学科研究	125
5.5.4	注重翻译测试的影响研究	126
5.6	小结	127
第六章 翻译技术教学研究		128
6.1	引言	128
6.2	研究概述	129
6.2.1	国外研究概述	129
6.2.2	国内研究概述	132
6.2.3	国内外研究特点	136
6.3	核心研究话题	136
6.3.1	计算机辅助翻译教学研究	137
6.3.2	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教学研究	138
6.3.3	本地化教学研究	140
6.3.4	技术写作教学研究	142
6.4	研究案例分析	144
6.4.1	提升技术思维能力研究	144

6.4.2	技术教学的跨学科实验研究	145
6.4.3	技术工具的教学验证	146
6.4.4	专利翻译的 PKM 教学法	147
6.4.5	CAT 教学的 PBL 教学法	148
6.5	翻译技术教学研究展望	149
6.5.1	研究主题多元化	149
6.5.2	专题教学研究深入化	151
6.5.3	研究方法多样化	151
6.6	小结	152
第七章 翻译教师研究		153
<hr/>		
7.1	引言	153
7.2	研究概述	154
7.2.1	国外研究概述	154
7.2.2	国内研究概述	156
7.2.3	国内外研究特点	158
7.3	核心研究话题	159
7.3.1	翻译教师教学活动研究	159
7.3.2	翻译教师教育研究	161
7.3.3	翻译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	163
7.3.4	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研究	164
7.4	研究案例分析	166
7.4.1	翻译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166
7.4.2	翻译教师职业能动性研究	167
7.4.3	翻译教师素质研究	168
7.4.4	翻译教师教育研究	168

7.4.5 翻译教师培训研究	169
7.5 翻译教师研究展望	170
7.5.1 探索翻译教师跨学科、跨领域研究	171
7.5.2 拓宽翻译教师研究主题	171
7.5.3 拓展翻译教师研究对象	172
7.5.4 丰富翻译教师研究方法	173
7.5.5 展开中外翻译教师研究对比	173
7.6 小结	174
结语	175
<hr/>	
参考文献	178
推荐文献	209
索引	211

总序

翻译是沟通不同语言文化的中介和桥梁；翻译也是不同语言容器里文化内容的交换。人类的进步、文化的繁荣皆与翻译密不可分，怎么估量它的意义也不为过。然而，翻译的价值至今未得到应有的评价，对翻译活动及其影响的研究也远远不够。

季羨林先生曾从事非常重要的文化翻译工作，对翻译有着深切的体会和极高的评价。他谈及五千年中华文明虽历经波折却始终绵延不绝、蓬勃发展的原因时，曾这样说：

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

一语道尽翻译对中华文化的演进、对人类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巨大作用。

翻译活动最基本的三个要素是语言、文化和译者。语言离不开民族、社会、文化，并浸润其中；双语文本转换离不开执行转换的人，即译者；

译者则必定是因某种语言文化滋润而生又受到另一种语言文化“增补”的人。于是，翻译成为语言文化间的信使。在翻译三要素中，最容易看见也最容易理解的是语言这个要素。因此，从古至今对翻译的关注都从语言开始，都跟语言分不开。这既就是说，若没有语言，翻译就无所依附；同时又是说，若没有千差万别的语言，也就不需要翻译。因此翻译与语言有天然的联系。

但我们说翻译离不开语言时，并不意味着翻译是语言的附庸，或语言可以完全离开翻译。一方面，翻译与语言几乎是共生的，没有脱离语言的翻译。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到，若无翻译，语言的交流、认知和传承等重要功能就难以充分展开；没有翻译，人们只能与来自本地域的人而不能与来自其他地域的人深入交流和沟通；没有翻译，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描述也受到局限，不能同其他地域操不同语言的人们分享经验和探讨问题；没有翻译，知识的传承范围有限，受益范围有限。Casagrande (1954: 338) 在考察翻译目的时提出了“译者事实上不是在翻译语言，而是在翻译文化”的观点。这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一是翻译所涉及的两种语言都是一定社会文化的产物；二是翻译活动的动因及其影响背后都有文化因素在起作用；三是翻译的难点有时并不单在语言的差异上，而是在文化的距离上。

由此可见，翻译的中介性是双重的，它不但表现为传统认识上将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这样直接的中介性，还有另一层意义上的中介性，即译文间接地对所译入的母语及其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有这些都表明，翻译是一项极为复杂、特殊的人类思维与人类交往活动。

对于翻译这样重要而又复杂的活动，千百年来人们抱有经久不衰的好奇心和探究心：

从思维层面尝试阐释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理论翻译研究的着力思考点；

从实践层面努力解决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应用翻译研究的关注重点；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分析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翻译文化研究上下求索的要点；

从各类语料库驱动的视角考察上述翻译沟通问题，是语料库翻译学的兴趣所在；

从古至今频繁进行的口译活动，则是探究隐秘心理过程的关键实验台。

这套“翻译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即分理论翻译研究、应用翻译研究、翻译文化研究、语料库翻译研究以及口译研究五个板块，对翻译问题给予了全方位的关注。

“理论翻译研究系列”梳理国内外翻译理论的发展脉络，从哲学和文化层面总结概括翻译学方法论在中西方的发展历史及特点，并对翻译研究中起步较晚、发展较快的新兴研究领域作了重点介绍。本系列首批计划推出《国外翻译理论发展研究》《翻译过程研究：理论、方法、问题》《译学方法论研究》《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等四部图书，其特点如下：（1）纵横阐述。这些图书既从历时的角度描述了翻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历程，还对当前的主要观点和流派，特别是对最新的认知心理过程研究模式作了细致的分辨和论述。（2）中外互鉴。对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理论作了系统归纳，透视出中外文化背后哲学思想和理念的异同。（3）点面结合。既有对理论和流派的全面梳理，又兼顾对研究热点和研究走向的前瞻式分析。

“应用翻译研究系列”首批推出的选题不仅有致力于翻译教学方法和实施效果探讨的《翻译教学研究》，以及以翻译教学应用为导向的、以实证型研究方法为主的《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和《翻译能力研究》，还包括探讨翻译技巧、翻译策略在具体领域（如科技翻译、商务翻译、新闻翻译等）中如何应用的《实务翻译研究》。此外，随着计算语言学等学科的发展，翻译技术发展迅速，成为现代翻译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要素，《翻译技术研究》也是本系列首批推出的选题之一。

“翻译文化研究系列”重在探讨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和影响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作用。翻译文化研究是在当下学科疆域迅速扩大的背景下，指导我们在译学领域如何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展开的重要译学课题之一。这个系列包括中国和西方的翻译文学、文化史研究，中国典籍外译研究，以及中文小说的英译研究，这些都是我国近十年来翻译研究发展最为显著的领域。此外，该系列还有专著对翻译史研究方法加以阐述。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各类双语语料库的创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采用平行语料或类比语料进行翻译研究。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方法日益受到研究者青睐，研究范围涉及翻译语言特征、译者风格、语体变化、语言对比、翻译规范、翻译教学、语言接触以及相应的双语语料库技术等等。“语料库翻译研究系列”首批策划出版的选题包括以下六部：《语料库翻译学理论研究》《双语语料库的研制与应用》《语料库文体统计学方法与应用》《基于语料库的文学翻译研究》《基于语料库的应用翻译研究》和《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和语言接触研究》。这些选题重视理论与实践结合，兼顾文学文本与应用文本翻译，将数据检索与统计方法运用到语言和翻译研究当中，实现了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形式和意义、文体和诗学分析的有机结合，代表了大数据时代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

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子学科，口译研究十多年来发展迅速，摆脱了过去经验式的探讨，开始运用现代技术开展关于口译（包括同声传译和交替传译等）认知过程各类实证研究。“口译研究系列”首批推出的选题包括从学科建构视角梳理口译研究的发展脉络和方法路径、提出整体性口译研究框架的《口译理论研究》，致力于口译教学方法应用和实施效果探讨的《口译教学研究》，以及系统探讨基于语料库的口译研究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向的《语料库口译研究》。

以上也是近二十年来国际译学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当然，丛书也有未顾及的一些问题，如翻译叙事研究、机器翻译、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也许以后还有机会弥补。我们期待通过这套丛书，与读者共同探讨翻译研究的种种重要问题，梳理相关研究的国内外进展，评介主要的理论、方法、流派，判断和设计研究课题，分析今后的发展趋势，并推介重要的参考文献。希望读者朋友，特别是初涉翻译研究的青年研究者能够开卷受益，拓宽视野。

王克非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8年11月

参考文献

季羨林，2007，《季羨林谈翻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Casagrande, J. B. 1954. The ends of trans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20(4): 335-340.

前言

在中国发展进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翻译始终担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先导作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对外交流和国际交往的需求与日俱增，翻译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中国故事讲得好不好，中国声音传得远不远，翻译工作是基础”，“翻译人才是核心”（陈雪亮 2022：4）。2021年，中宣部、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翻译人才队伍建设规划 2021—2025》，这说明国家非常重视翻译人才，尤其是中译外人才的培养。

翻译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是翻译教育的动力之源。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高等学校责无旁贷。2022年9月1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将翻译专业列入文学学科门类专业学位类别，不仅可授予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还可授予翻译博士专业学位（DTI），这标志着我国从本科到硕士、博士完整的翻译专业教育教学体系基本建立了起来。然而，在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简称 AIGC）技术迅猛发展的新时代，翻译教育体系又面临新的技术挑战。如何立足时代对翻译人才提出的新的需求，提升翻译人才培养质量，是翻译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过程中必须思考的课题。翻

译从最早作为单纯的外语教学方法，发展为独立的专业和学科，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翻译教学进入高等教育以来，就一直是外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培训和翻译教育都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方式。系统的、高效的培训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学员的翻译技能和工作水平有较大的提升。培训目的性强，因此强调短期效果，以专门的技能性训练为主，培养学员在工作中兼顾多方的利益、承担一定的风险，同时要遵守职业道德规范、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等，为翻译行业与职场直接输送合格人才。例如，我国正规的翻译培训始于1979年联合国与我国政府合作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训练班（部），开设口译和笔译两个班，学制两年，这是早期为了给联合国输送译员而进行的高校翻译培训。1994年，经过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北外设立高级翻译学院，正式开始翻译教育和教育活动。翻译培训作为一种专门的、技能性的训练，具有时间短、收效快、实用性强的特点，学员可以获取产出可接受翻译产品所需的技能，其中大部分为语言技能。但是，想要提高翻译技能，还需在实践中反复磨炼，不断地积累经验和总结教训，深入细致地分析每次训练的结果和遇到的问题，找出不足和差错。这就要求学员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和分析批判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有“源头活水”，促使学员不断提高综合素养，从而完成难度较大的翻译任务。因此，我们还需要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开展翻译研究，进行多方位、持续的、系统的翻译教育。“翻译教育不仅要开展翻译技能的教学，还要通过系列教育手段，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观、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穆雷 2021：3）。口译教育则要求学习者提高人际交往能力，学会和客户、其他译员、发言人、听众等打交道，同时要考虑伦理、译员角色、社会责任、公民意识等其他职业因素。口译教育的目的是“为学生赋能，让他们羽翼丰满，步入社会后成为一名合格的成员”（Kiraly 2000：6），“让年轻的专业人员成为全面发展的公民，而不仅仅是拥有行业技能的人”（Pym 2011：9）。目前国内外的

高校、民办教育机构和翻译公司在非学历教育领域开设了一些翻译培训课程，但是都存在各种问题，不利于翻译教育的职业化发展。

翻译培训可以作为翻译教育的重要辅助，通过开展非学历教育直接对接翻译行业；但同时我们要深化高校的翻译教育，在“全人教育”理念下，以学生为核心，设计系统的翻译核心课程和通识课程，提升译者能力，从本科教育开始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翻译通才以及部分垂直领域的翻译专才。在教学活动中，翻译教育呈现出其独特规律，涉及翻译课程改革、翻译教师发展、翻译教材建设和教学资源开发、翻译教学测试与评估、翻译专业建设、翻译人才培养模式、翻译政策与管理、翻译教学制度建设等诸多方面，这些构成了翻译教学研究的对象。翻译教学研究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口笔译员提供了科学方案和正确导向，大大助推了翻译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翻译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翻译教学研究与翻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是翻译学科建设重要的组成部分。“一方面，翻译教学的发展依赖于并得益于翻译学学科的建设，而另一方面翻译学学科建设也离不开翻译教学。回顾学科从无到有的历程，正是翻译教学的不断发展为翻译学学科发展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基本的条件”（蓝红军 2015：33）。刘宓庆（2003：12-13）指出，翻译教育是翻译学科建设的一项根本建设，而翻译教学建设是翻译教育建设中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一环。翻译教学建设既包括翻译教学实践，也包括翻译教学研究，如翻译教学培养目标、师资队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课程评估以及教学组织与管理等。翻译教学的许多方面，如师资队伍建设和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等本身就是学科建设的内容。因此，要重视翻译教学研究，积极汲取前人研究之精华，不断拓展翻译教学研究的理论视角与实践路径，健全翻译教学评价体系，全面提升翻译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

同时，翻译教学是培养翻译人才的重要途径。翻译教学研究的发展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夯实翻译学科的研究基础，更能为国际组织、为国

家和社会输送大量高端翻译人才和语言服务人才。随着翻译教学不断向着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教学内容逐渐接近翻译市场和翻译行业要求,教学过程程序化、技术化,教学模式项目化、合作化,教学评估路径多元化,评价体系动态化,这一切变化都给翻译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ChatGPT 等技术有助于实现智能教育应用生态的全面升级和效能提升,将“促进知识为重到能力为先的理念转变,加快教育全要素重构(数据—主体—环境—资源)、教育全空间重塑(物理—信息—社会)、教育全流程融合(教—学—管—评—测)和教育全评价改革(结果—过程—增值—综合),从而全面加速教育体系的演进”(夏立新 2023: 11)。虽然以 ChatGPT 为代表的新型人工智能作为“类人教师”具有强大的能力,但目前还没有为翻译教育教学的数字化与智慧化转型提供强大动能,同时还有可能引发教学主体关系异化,带来伦理、知识安全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周忠良 2023: 138)。因此,新时代我们更要与时俱进,加强翻译教学的跨学科研究,完善翻译教育体制,推动翻译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翻译教学研究的目标在于提升翻译教学效果,提高翻译教育质量,满足新时代国家战略需求和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需要。因此,在翻译技术风起云涌的新时代,更要加强翻译教学的本体、客体和主体研究,加深翻译技术教学研究,让技术为翻译教育赋能,高效率培养“有文化、善思辨、懂管理、会技术、口笔译能力俱佳”的语言服务人才。

然而,在国家经济发展与建设的大局之下,在整个社会重视翻译人才培养的呼声中,如何培养翻译人才、如何对翻译的教与学进行深入研究,并没有出现相应的热点。根据穆雷、李希希(2019)的研究,博士论文中翻译教学研究论文仅占总数的 5.6%,期刊发表的翻译教学研究论文在所有翻译研究论文中仅占 6.7%。这些数据表明,在翻译学科框架下,翻译教学研究受到的关注意识明显不足。为了引导更多教师成为翻译教学研究的主体,加大翻译人才培养路径和策略研究,本书在梳理国内外翻译教学研

究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确立翻译教学研究的学科地位，介绍研究的方法和途径，概括研究的特点和不足，进而指出未来发展趋势和热点问题。

本书共七章。第一章梳理国内外翻译教学的发展历史，确立翻译教学研究重要的学科地位，综述其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勾勒翻译教学研究的发展概况并总结其特点，概述翻译教学研究全景。第二章主要研究翻译课程设置，列举国内外代表性翻译课程设置，分析具体的研究案例，呼吁对翻译课程设置进行内部和外部联合研究。第三章聚焦翻译教材研究，在总结翻译教材特点的基础上，描述专题类教材研究，提出要加强理论建设研究、教材与教学的关联研究、教材智能化研究和实证研究。第四章考察翻译教学方法研究，分析代表性翻译教学方法，具体研究各种不同方法的使用及其教学效果，希望未来能够强化汉译外教学方法的研究，扩大研究范围，加深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对比研究。第五章主要探讨翻译测试与评估研究，核心话题包括翻译测试设计构念、能力框架、设计质量检验和测试评估模式等。代表性研究案例表明，该领域需要加强跨学科研究，注重定性定量相结合，借鉴语言测试的研究成果，侧重测试的影响研究。第六章关注翻译技术教学研究，聚焦计算机辅助翻译（computer-aided translation，简称 CAT）、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本地化、技术写作教学研究，并分析了五种翻译技术教学的研究案例，建议未来丰富研究主题，深化研究层次，开展中外对话，加强翻译技术教学的跨学科研究和定量研究。第七章主要阐述翻译教师研究，发现该领域的核心研究话题包括教师教学活动研究、教师教育研究、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和教师教学研究，进而通过研究实例分析如何对教师应然能力、职业能动性进行研究，以及如何进行翻译教师实证研究和翻译教师培训研究。

第二至七章中，每一章均包括引言、研究概述、核心研究话题、研究案例分析、研究展望、结语等内容。每章在选择代表性成果或者核心研究话题时，基本原则是对研究概述中没有展开的主题进行详细介绍，选取有代表性的学者观点、核心话题或者论文集、专著，旨在引导读者由“面”

到“点”地了解这一领域；而研究案例分析则聚焦国内外已发表的高质量学术论文，通过分析论文的选题、研究思路、创新点和撰写技巧，引导年轻学者从中获得启示。

本书的写作始于2021年6月在浙江大学召开的新时代全国一流翻译专业建设研讨会。我在会上很荣幸遇到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翻译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的总主编王克非教授，他听完我的主旨发言后就说：“你来写这本书比较合适。”欣喜和意外之余，我欣然接受了这一重任。翻译教学与研究一直是我研究兴趣之所在，我也一直想基于“翻译教学理论与实践”课程写一本这样的入门手册，引导和激励更多教师走进翻译教学研究，通过研究教学并将成果运用于教学实践，提升教学能力，更加高效地培养高端翻译人才。感谢王克非教授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给了我实现梦想的机会！

本书获得了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的专著资助。在写作过程中，我得到了翻译教学研究同行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穆雷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彭萍教授、湖南大学王湘玲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王树槐教授的精心指点，获益匪浅。感谢中央民族大学覃俐俐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温辉老师的不断鼓励和支持，感谢我的博士生李雯露、解昊川、周正阳和胡伊伊帮忙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资料，感谢博士后杨言老师帮忙审读和校对书稿，感谢我教过的研究生在课堂讨论中分享的建议和洞见。特别感谢外研社编辑都帮森老师的鞭策和温馨提醒，特别敬佩责编步忱老师的专业审校与细心编辑。本书是对翻译教学研究的研究，吸纳和借用了众多同行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书中不足之处，还请读者诸君多多包涵和指教。

陶友兰

2024年3月8日

于复旦大学书馨公寓

翻译教学研究概述

1.1 翻译教学研究的学科定位

“翻译教学是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活动的结合。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同时也是将某种翻译思想具体化，对一定翻译理论或设想进行验证的过程”（方梦之 2004：346），是“指为满足对翻译人才的特定需求，以塑造与之相应的翻译观念和培养必需的翻译技能为目的的教学活动”（方梦之 2011：310）。本书中的“翻译教学”主要面向翻译专业，分为笔译教学和口译教学。笔译教学以书面文本为练习对象，通过分析文本特色和对比中外语言的不同点，找出翻译难点，教会学生采取有效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进行灵活的转换，达到顺利有效的沟通目的，实现跨语际、跨文化交流。笔译教学既包括理论教学，也包括实践教学，还包括初级阶段的语言对比教学和翻译技术工具使用与研发教学。口译教学则是以真实或者模拟真实的口语材料为练习对象，现场播放、现场练习的一种课堂活动，具有即时性、瞬间性和灵活性特点。口译教学主要以口译主题或者技巧为导向，一般分为交替传译、视译和同声传译；除了培养口译技能以外，还重视培养学生在公众面前讲话的技能和承受压力的心理素质。

翻译成为高校的一门专业，在我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和论证。

由于香港的双语教学环境和对翻译人才的旺盛需求，香港中文大学早在1972年就成立翻译系，从本科阶段培养翻译人才。随后招收翻译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学校还有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公开大学等。台湾辅仁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彰化师范大学、长荣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等高校都设有翻译系或翻译研究所，招收翻译学研究生。在大陆（内地）的高等院校中，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交流活动增多，对翻译人才的需求日益高涨，翻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进而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和学科。1994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高级翻译学院。1997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成立翻译系。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获准建立独立的翻译学硕、博士点，标志着我国大陆（内地）高等院校在翻译学科和学位点建设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06年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与河北师范大学这三所学校获批试点招收翻译专业本科生，开启了大陆（内地）第一批翻译本科生的培养。经过译界学界同仁们的努力，2012年“翻译”正式进入教育部发布的本科专业目录，翻译学科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有了“名正言顺”的独立学科身份，目前已有383所院校招收翻译学专业本科生¹。2007年，15所院校成为首批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试点单位，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截止到2024年5月底，已经有316所高校设立翻译硕士专业²，为国家培养了一批“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口笔译人才。2022年11月26日，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年会交流了关于翻译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意见，2024年正式启动翻译专业博士招生，首批招生单位共有9所学校，分别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政法大学、黑龙江大学、湖南师范大学。³在学术学位方面，

1 数据来自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

2 数据来自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教学协作组。

3 数据来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官网公示。

1979年部分高校开始招收“翻译理论与实践”方向硕士生。1990年以后大部分外语专业开始招收翻译研究方向的博士生，目前获得博士学位的超过千人。还有毕业的博士和青年翻译教师进入博士后流动站开展翻译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本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组成的完整的翻译人才培养体系。对此，许钧在2019年的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年会上感叹道，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把翻译同国家的伟大复兴与人类的进步事业这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指出翻译教育是中国人才培养的一项创举，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在如此短的历史时期内，构建一整套翻译教学与翻译教育的体系（许钧2019）。

国际上早期的译员培训一般由翻译公司组织。根据柯平、鲍川运（2002）对世界各地高校的口笔译专业与翻译研究机构的介绍，国际上翻译教学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有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西班牙、比利时等。口译直至20世纪才被认为是一门职业，并且需要正规的培训（Stern 2011）。1929年，欧洲第一所口译研究机构诞生于曼海姆应用科技大学，后于1933年并入海德堡大学。目前，德国的三大翻译学院为海德堡大学翻译学院、美因茨大学翻译学院和萨尔大学翻译学院，同为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Conférence Internationale Permanente d'Instituts Universitaires de Traducteurs et Interprètes，简称CIUTI）的创始成员。国际大学翻译学院联合会是国际权威翻译教育认证组织，于1960年创建，致力于保障高质量的口笔译工作，帮助优秀译员适应不断变化的职业环境，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口笔译理论研究，并对口笔译人员进行培训。近几十年来，口笔译教学项目迅速增加。到2006年，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380项口笔译培训项目（Kelly & Martin 2009: 294）。截至2013年，全球本科层次翻译院校约500所（Pym 2014），但是翻译教学规模一般都不大。大部分翻译教育在硕士层面进行，英国有30个不同方向的翻译硕士项目，主要为欧盟培养翻译人才，即“欧洲翻译硕士”（European Master's in Translation，简称EMT）。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

利兹大学、杜伦大学，美国的蒙特雷国际研究院、肯特州立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马里兰大学，加拿大的渥太华大学，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大学，法国的巴黎高等翻译学院，比利时的鲁汶大学，澳大利亚的西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等学校的翻译教学和研究备受瞩目。

随着人工智能和翻译技术的飞速发展，翻译进入职业化和专业化时代，成为语言服务行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翻译成为一门职业，积极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外贸和国际交往。人们对译员的要求和期待不断提高，汉译外翻译人才培养质量及其标准也在提升。2015年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对翻译专业人员和主要任务进行重新描述，新增译后编辑、术语库和翻译记忆库建设、翻译研究、翻译教学等内容，大大拓宽了翻译职业的外延。职业译员除了需要具备较高的双语水平和翻译技能以外，还要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具备多元知识结构，关注伦理道德，了解职场行情和译员职责，能够运用翻译技术和翻译管理完成大型翻译项目，具备跨文化交际技能等非语言能力和良好的生理及心理素质，规划终身学习、自我发展等。要培养“育得出、留得住、用得上”的翻译人才，高等院校要和企业协同育人，实现政产学研融合。

翻译成为一门专业和职业以后，迫切需要学科定位。而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源自 Holmes (1988) 对翻译研究的界定。他认为翻译研究是一门经验学科，可分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性翻译研究两大分支。其中，他提出译员培训是应用性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随着时代进步和翻译行业的不断发展，翻译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内涵日益丰富，原有译学研究框架已不能完全满足当下翻译研究的需要。

翻译研究涉及比较文学、语言学、跨文化交际、文化研究、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借鉴语言学、文艺理论、跨文

化交际等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口笔译活动及其规律，文学与文化的跨语言、跨民族、跨国界的传播、接受和交流的规律及相关理论问题，主要内容包括翻译理论、翻译史、翻译政策、应用翻译、翻译批评、翻译教学研究、口笔译研究、机器辅助翻译研究、翻译产品等。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 2014: 112)

因此，翻译学科建设必须与时代发展的脉搏一致，一方面要坚持其学术性和学科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又要服务社会，符合翻译市场和行业的需求，更新翻译教育理念，将翻译技术融入翻译课程体系，革新教学模式和方法，培养出更接地气的专业翻译人才。

鉴于翻译教学在世界各地的蓬勃发展，以及翻译教材及其研究在中国翻译教学中的重要作用，陶友兰 (Tao 2005: 192) 提出“将 Holmes 的翻译研究地图 (map of translation studies) 中的‘译员培训’改为上义词‘翻译教学’，将翻译教材、教学方法、测试工程、课程设置位于同等的地位，纳入 Holmes 的应用性翻译研究”，丰富和拓展翻译教学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围。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更应该对翻译教师进行大力研究，“强国先强师”，发挥翻译教师的职业能动性和积极性，才能更好地建设翻译学科。罗列、穆雷 (2010) 也认为翻译教学应该列入应用性翻译研究，确立其学科地位。翻译教学之所以在学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日益增长的翻译人才需求和巨大的翻译市场为它的发展孕育了非常和谐的外部环境。翻译研究学科体系化建设，关键在于翻译实践研究、翻译教学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这三环之间的互动与关联 (傅敬民、袁丽梅 2017: 84)。Colina (2003: 4-5) 则进一步认为，翻译教育问题应该贯穿翻译研究的主要领域：理论翻译学要对翻译能力及其获得进行研究，描述翻译学更要研究学生的“黑匣子”。一方面，翻译研究理论分支的信息可以成功地传递到应用分支；另一方面，翻译教学的成果可以反馈给理论翻

译学，并验证实证研究的信度。Venuti (2017: 12) 认为“在教学中融入描述翻译学，有助于翻译教学的创新与提高”。综合以上观点，笔者对 Holmes 提出的翻译研究地图上进行了改编，确立了翻译教学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见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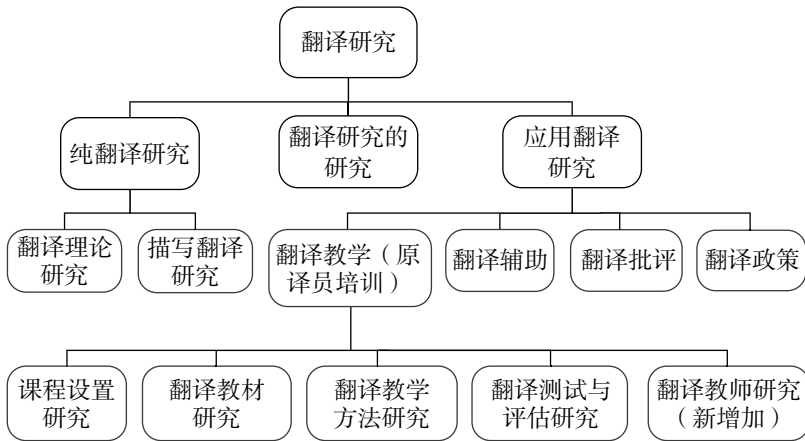


图 1.1 翻译教学研究在翻译研究中的定位
(改编自 Holmes 1988; Tao 2005; 朱健平 2018)

1.2 翻译教学研究的核心要素

要做好翻译教学研究，研究者需要具备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方法论意识和理论意识（陶友兰 2022）。首先，要善于从翻译课堂和文献阅读中发现问题；然后思考采取什么合适的研究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从什么样的理论视角阐释或解读这个问题；最终落脚于该研究问题对翻译人才的培养以及翻译的教与学起到什么样的启示或提供什么样的借鉴。

1.2.1 研究内容

翻译教学内容丰富，研究主题主要包括国（境）外翻译教学介绍、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翻译测试与评估、翻译教材研究、教学大纲与课程设置、语料库与翻译教学、翻译师资发展、翻译教学与专业建设和学科发展、翻译教学与人才培养等。口译教学研究主题有口译技巧教学、口译量表及学能测试、计算机辅助口译教学、法庭口译及医疗口译培训、口译质量评估、口译员角色及伦理等，体现了目前口译教学中课堂与市场结合、模拟实战场景的趋势。这些主题按照选题来分，可以分为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主要包括翻译课程设置、翻译教师、翻译教材、教学方法与模式、翻译测试与评估，也是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和“新文科”建设的飞速发展，翻译教学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变化和扩展，外部研究逐渐凸显，主要包括影响翻译教学的翻译技术、翻译政策、翻译行业、教学管理和教学环境等。翻译教学研究的具体内容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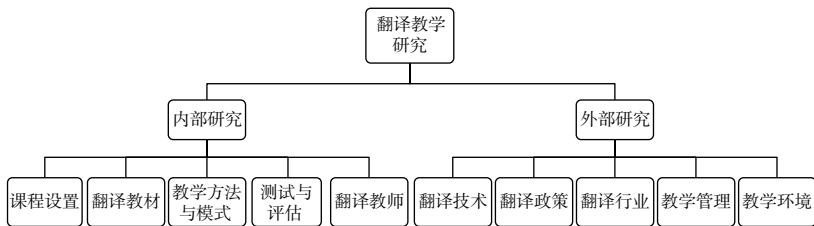


图 1.2 翻译教学研究内容

翻译教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互为补充。外部研究考察影响翻译教学的宏观因素，内部研究聚焦翻译教学的具体操作。例如，外部研究揭示翻译技术的行业应用前景，而内部研究则探索如何将这些技术融入课堂。内部研究的成果，例如教学方法和理念的更新，促使外部教学环境和教学管理同步改变；外部研究的成果则会促成内部研究成果的转化，提供相应

的保障。内外研究互动，有利于翻译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整个翻译教育领域的发展。

不管是外部研究还是内部研究，具体研究内容还是由研究者来决定。外研社 2020 年对参与暑期培训的教师（共 84 人，大部分是青年教师，均有五年以上的翻译教学经历）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53.49% 的教师表示开展翻译教学研究最大的困惑是找不到合适选题。目前教师们最为感兴趣的研究主题是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其次是翻译测试与评估、现代技术与翻译教学、语料库与翻译教学。因此，有必要梳理翻译教学研究领域的主要选题，供新手学习和研究。关于翻译教学内部研究的现状和未来趋势，本书第二至七章有详细阐释。翻译教学外部研究目前成果不是很多，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和加深这一领域的研究。例如翻译人才培养这个话题，就可以从以下十个方向入手，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讨论：（1）对外传播战略与中译外翻译教学实践；（2）国家翻译实践与高端翻译人才的培养；（3）人工智能时代翻译人才的培养；（4）全球化时代翻译教育合作模式；（5）政产学研融合的翻译人才协同育人模式；（6）高端翻译人才培养的跨学科模式；（7）翻译与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8）大语言模型对翻译教育的影响；（9）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技术）教学；（10）翻译技术教学体系构建和管理。

目前翻译教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翻译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生，还可以适当拓展至校外参加非学历培训的学生、高职高专学生或者翻译爱好者，关注不同水平学习者在翻译学习过程中的动机、策略、风格、自我效能感、信息素养等。在研究翻译教师时，也可以进一步将其细分为职前教师、优秀教师、卓越教师等，不但可以研究他们如何教学，还可以通过访谈、个案分析来研究他们在翻译教学中的情感、信仰、动机、知识结构、职业发展和身份认同等。翻译教学的主体还可以包括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培养单位的管理人员、教务人员等保证翻译教学质量的共同体。

1.2.2 研究范式与方法

1.2.2.1 研究范式

翻译教学研究需要遵循一定的范式。“范式”(paradigm)一词源自希腊语 παράδειγμα,意思是“模范”或“模型”,指“特定的研究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研究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方法、仪器和标准等”(Kuhn 1962: 10),通常被广泛地用来描述一定历史时期被普遍接受的一种广义的模型、框架、思维方式或是一种理解现实的体系(Cohen *et al.* 2003)。“认识论—方法论—方法”是广为学界接受的研究范式,它同样适用于翻译教学研究。

在教学研究中,研究者的认识论决定了他们对教学现象和教学问题的认知和分析,进而决定了他们所采取的方法论,最后体现为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可分为两大类型,即客观主义认识论主导的研究范式和主观主义认识论主导的研究范式。图 1.3 展示了客观主义认识论主导的研究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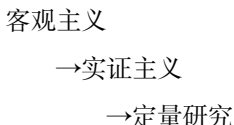


图 1.3 客观主义认识论主导的研究范式

在客观主义认识论主导的研究范式下,研究者认为社会本质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他所持立场无疑会深刻地影响他发现和获取知识的方法,亦即方法论。如果知识是刚性、客观、有形的,那么研究者就是客观存在的观察者,需使用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如实验、测量、统计等进行量的研究,我们将这样的研究者称为实证主义者。反之就是反实证主义者,他们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如图 1.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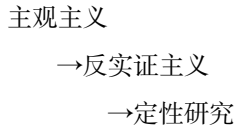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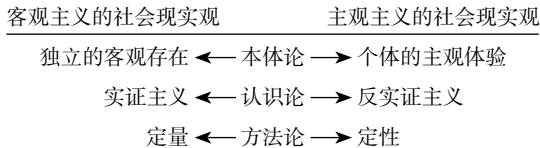


图 1.4 主观主义认识论主导的研究范式

因此，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本体论，从而决定了认识论和方法论。理论框架的选择源自研究者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参见图 1.5。

图 1.5 世界观和方法论 (Cohen *et al.* 2003, 转引自张莲 2008: 52)

1.2.2.2 研究方法

翻译教学研究方法就是指翻译教学研究所采取的手段、途径和可操作规则或模式。刘宏伟、穆雷(2013)建议,翻译教学研究应借鉴其他成熟学科如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的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开展研究。例如,教育研究中常用的定性研究方法(行动研究、个案研究等)及心理学实证研究方法(调查法、实验法等)都可在翻译教学研究中加以应用。

翻译教学研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研究方法包括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以往的翻译教学研究大多数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所占比例较小。但从 2013 年以后,翻译教学研究中的定量研究论文越来越多,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实验和观察法收集数据。定量研究则主要通

过访谈、观察等方法来收集文本数据。翻译教学研究的具体研究方法包括经验总结法、理论思辨法、个案研究法、访谈法、课堂观察法、实证调研法、行动研究法等。通常情况下，可以交互式地采用多种方法开展研究，将思辨与实证相结合，多维度、深入地翻译教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在外研社 2020 年对参加暑期培训教师的问卷调查中，有 44.19% 的青年教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研究方法，48.84% 的教师反映不会整体设计研究思路。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主要研究方法的应用。

1) 定性研究方法举例

经验总结法和理论思辨法依然被研究者使用。经验总结法主要是兼任译员的授课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实践和翻译实践，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或原则，例如“惑—诱—产”翻译教学法就是王树槐（2013：140-150）基于个人研究和教学实践提炼出来的。理论思辨法要求研究者高瞻远瞩，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宏观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如此才能娓娓道来，指点教学迷津，例如何刚强（2022）提出的“译写”就是运用了这种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法、访谈法、课堂观察法经常混合使用。例如研究翻译教师的教學能力，就可以选取某个或某几个教师的翻译教学课堂作为个案，进行课堂观察，并对教师、学生展开访谈，获取所需的信息和资料，然后进行分类、归纳、整理、提炼，从中发现问题或者获得验证信息。吕冰（2018）的博士论文《翻译教师笔译教学实践性知识的个案研究》、张军等人（Zhang *et al.* 2023）关于教师获得幸福感的要素研究，都是很好的案例。关于如何有效使用访谈法，研究新手可参考《翻译教师研究中访谈新手的问题及其对策——以访谈提纲设计为例》（覃俐俐、陶友兰 2022）一文。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指的是行动者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自己实践中的问题。翻译教师作为翻译教学和研究的一线行动者，在教学方案制定、课堂导入设问、问题分析和解决、课后反思和提高等环节，常常在

无意之间经常地运用行动研究法，这充分说明了运用行动研究法提升教学效果的可行性、相容性和便利性。行动研究的核心要素是“教师成为研究者”。

我国学者将行动研究法的过程描述为：(1) 发现问题；(2) 分析问题；(3) 拟定计划；(4) 搜集资料；(5) 批判与修正；(6) 试行与考验；(7) 提出报告。研究者先试行计划，不断收集各种资料或证据，以验证假设，改进现状，直到能够有效地消除困难或解决问题为止。国外学者把行动研究分为技术合作实证主义研究、实际协商解释主义研究和批判解放性行动研究三种类型 (Norton 2009: 53)。基于对教学实践的反思，Norton (2009: 70) 提出了高校语境下的“教学行动研究”，概括为五个步骤：识别问题领域、思考解决方案、实施方案、评价方案和改进实践。高校语境下的教学行动研究要求课程开发者和教师以研究者的姿态参与课程活动，遵循 McKernan (1996: 173-200) 描述的研究者的伦理道德标准，应用观察、叙述和谈话分析的方法，在教学情境中求解问题的技术策略，反思和评价研究资料的技术程序等，对具体课程进行反思，重点研究与课程教学计划、内容选择、教学过程、绩效评价方法等密切相关的问题。

Hatim (2001: 6-7) 认为，以实践为驱动的行动研究强调“实践—理论—研究—实践”的循环过程，集研究焦点于反思性实践，是一种理想的翻译研究方法。在翻译教学研究中，以行动研究著称的学者还有 Ana Cravo、Josélia Neves、Donald Kiraly、Séverine Hubscher-Davidson、杨晓华、吴青等。以杨晓华的《翻译教学中的课程行动研究——以 BTI 文化翻译课程为例》一文为例，该研究遵循如下研究过程：界定课程问题，确定问题核心；拟定、修订、确定、实施课程方案；观察、收集、分析、评鉴数据；依据方案的实施结果，撰写实践报告，整体评鉴课程行动研究。研究提出的问题核心是，由于教师对学习者的翻译能力和知识结构估计不足，教学策略、情景设计与教学内容配置不够得当，导致教学过程沿袭理

论—演绎型和实践—归纳型教学模式。因此，研究者从课程设计理念与模式，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环境，绩效评价三个维度设计教学方案，并不断调整更新。基于教学系统观，遵循递归—反思性设计与开发模式，实行分级教学方案，分模块实施教学，创设现实翻译情境，构建以形成性评价为主导的评价与反馈机制。研究最后的文化翻译课程行动研究结果评鉴部分最为详细，研究者精心设计了调查问卷，从四个维度进行百分比统计，并通过七个表格，从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描述了学生对课程的看法和态度。“课程行动研究使教师行动者亲历行动逻辑建构和重构个人理性的独特过程，拓宽研究路径，构建新的教学理念和专业化知识，提升专业素养”（杨晓华 2012：113）。

2) 定量研究方法举例

实证调研法近年来在口笔译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尤其是在国际期刊发表的论文中。其基本步骤是：确定研究问题和目的、设计研究、收集数据、数据分析、结论和讨论。以何妍、陶友兰（He & Tao 2022）的《通过知行合一的翻译课程提升学生翻译技术思维能力的实证研究》（“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ng: An empirical study on a curriculum approach to developing students' translation technological thinking competence”）一文为例，其研究思路和步骤如下：

1) 明确研究问题。学生在学习翻译技术课程以后，遇到现实中的翻译问题不会解决怎么办？研究者根据平时的教学实践，提出知行合一的翻译技术课程设置（KATC），以提高学生的翻译技术思维能力（TTTC）。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KATC 能否提高学生的 TTTC？TTTC 是否会影响翻译质量？

2) 文献综述。交代问题的背景（翻译技术培训和教学）和界定核心概念（如 KATC、TTTC 等），发现翻译技术教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知行合一的翻译技术教学理念。

3) 研究设计。根据研究问题，确定研究对象、方法和材料。研究

者选择了两个班级分别作为控制组和实验组，通过曼—惠特尼 U 检验 (Mann-Whitney U test)，发现学生的翻译技术能力和翻译水平相近，具有可比性。在一个学期共 16 周的教学过程中，研究者对实验组实行 KATC 干预。首先，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翻译任务，在课程开始前使用前测试卷，在课程结束后用后测试卷，分别对两个班级的学生进行测试。然后，邀请分别来自业界和学界的三位老师给学生在课程前后完成的译文打分，确保数据质量和可靠性。最后，通过录屏、反思性访谈对比学生的译文质量和对待技术使用的态度，确立因变量和自变量。

4) 数据收集和分析。收集翻译任务完成情况、小测验结果和反思性访谈共三个方面的数据，然后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清洗、整理，运用统计软件 SPSS 或其他软件如 Stata、R 等进行计算，得出相关性、显著性等数值，整理为表格和统计图。

5) 结果和讨论。根据分析结果，解释数据中的规律、关系，包括 TTTC 的构成要素及其重要性讨论、KATC 和 TTTC 的关系以及 TTTC 与翻译质量的讨论，从而验证研究假设，证明假设成立，即 KATC 可以解决翻译技术教学中“会而不能”的问题。

6) 结论和建议。总结分析结果，得出结论，并提出建议：翻译技术教学应该以提高学生的翻译技术思维能力为目标，而不仅仅是教授软件操作。同时，指出本文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以上步骤，我们就可以运用实证调研法研究翻译教学中的问题，验证假设或者发现规律，并为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议。在实证分析过程中，确保数据的质量和数据分析方法的合理性至关重要。

定量研究方法还有实验法、调查法、相关性研究法等。实验法是实证主义定量研究的原型，目的是建立或验证一个理论假设，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其核心是选定变量、控制研究情境、操纵研究变量。调查法的目的是收集信息并作出推理，以概率理论为基础把信息和推理从样本推广到总体，常用工具是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作为一个

国家、地区或者教育机构决策的依据 (Cohen *et al.* 2003)。对于在真实、自然的状态中进行的研究,可以使用相关性研究法,通过多元回归等多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确定每一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综上所述,翻译教学研究可以采取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有经验总结法、理论思辨法、个案研究法、课堂观察法、访谈法、行动研究法等;定量研究方法包括实证调研法、实验法、调查法、相关性研究法等(见图 1.6)。在实际的研究中,也有同时使用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来收集、分析数据资料,整合研究发现以及作出推断的情况,这就是混合研究法。如何使用这些方法,请参考《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定性、定量与混合研究的路径》(克雷威尔 2007)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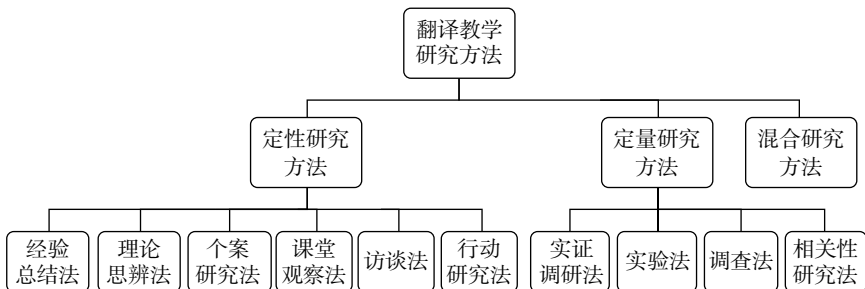


图 1.6 常用的翻译教学研究方法

以上每一种方法都有代表性论文,建议研究新手仔细阅读,思考、琢磨研究方法的运用和整体思路设计,记下难点和重点,然后去逐一试验,遇到问题可以寻找研究共同体一起讨论解决。只有在研究行动中不断体验、体悟,最终才会熟能生巧,到达研究的“自由王国”。

1.2.3 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在一些英文著作及文献中被表述为 *theoretical*

framework 或 conceptual framework。从本质上说，理论框架是用来解决研究问题的工具，它必然涉及一个或者多个理论的运用。同时，理论框架内的各个概念、原则变量、要素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论文的理论框架起到限制研究范围、引导研究设计和分析的作用，还可以作为实证研究的待验证假设或试探性理论。“不少人认为，在论文中或者研究计划书中，只要单独介绍一下某个理论，就是有理论框架了，其实不然。所谓理论，是对两个或多个现象之间具有某种关系的陈述。理论的应用是为自己的研究设计找到理论的支持和合法性”（周雪、康建东 2012：65）。

翻译是一种经验性行为，翻译教学更是基于实践的学术活动。所以，翻译教学研究可以是直接来自经验的分享和感悟。2000 年以前的研究大部分是对课堂教学法的描述，缺少理论性阐释或关照。翻译教学是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紧密结合的桥梁。翻译首先是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的转换，必然要受到翻译学、语言学、文化理论、文艺批评的制约和指导。同时，翻译教学又是一项教育活动，涉及教师和学生，必然和教育学、心理学理论相关。人工智能时代的翻译教学离不了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网络，还和大数据科学密切相关。

在选取翻译教学研究的理论框架时，既要考虑所选理论本身的理论价值，确保它有利于解决或分析研究问题，也要考虑所得出的成果对翻译学科本身的理论贡献，因此要遵循理论框架的建构原则：问题导向性原则、适度性原则、价值性原则和详尽性原则（穆雷、李希希 2016：100）。根据以往的研究经验和经历，不建议研究者一开始就选择某一种或几种理论，而应该问题先行，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再引入适度、有价值的理论去详细解读或者去验证。因此，研究者要提高翻译教学研究能力，建议熟读、了解以下理论，并能根据研究的实际语境灵活应用和引用（见表 1.1）。

表 1.1 翻译教学研究相关理论框架

相关学科	翻译教学研究相关理论框架
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文体学、篇章语言学、话语分析、风格标记理论
翻译学	功能主义理论、翻译目的论、释意派理论、改写理论、变译理论、描写翻译学、认知翻译学、翻译能力构建学说、翻译过程研究
文学、文化	比较文学、译者主体性理论、读者接受理论、翻译美学、文化翻译
教育学	社会文化理论、学习理论、课程论、二语习得理论
心理学	翻译心理学理论、认知负荷理论、图示理论、格式塔理论、整体主义理论
社会学	社会建构主义理论、涌现主义理论、复杂性理论
哲学	教育哲学（知行合一）理论、诠释学、苏格拉底式对话
大数据	机器学习理论、语言服务理论、语料库与数据挖掘理论

1.3 翻译教学研究的发展概况

翻译教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科地位，在国内外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回顾，总结哪些领域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哪些领域还需要努力拓展。关于国内外的翻译教学研究概况，我们可以检索到相关的综述论文或者宏观思考之作。这些论著聚焦研究主题，从共时和历时的角度收集研究数据并分类，并且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分析，探索翻译教学研究的关注重点和发展趋势（Tao 2016；郑晔、穆雷 2007；刘宏伟、穆雷 2013；王树槐 2013；古煜奎、邵曦瑶 2015；张文鹤、文军 2017；穆雷、李希希 2019；吴青 2023；许可、张威 2023）。翻译教学研究成果也体现了翻译学科的发展过程，接下来分准备阶段、初始阶段、发展阶段和繁荣阶段四个时期详述。

1.3.1 学科准备阶段的翻译教学研究 (1972—1992)

1972年 James S. Holmes 在其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阐述了翻译研究的命名、性质,以及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发展的目标、研究领域等问题,这篇论文具有划时代意义,是翻译学科的创建宣言。国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通讯》(今《中国翻译》)刊载了介绍国外翻译理论的多篇文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也出版了相关书目,推动了国外翻译理论的传播,对国内翻译学科的建立具有重要影响。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是我国译界学者开始探讨、思索和酝酿建立翻译学科的新起点。杨自俭、方梦之、谭载喜、穆雷等学者开始呼吁建立中国翻译学,并阐述建立翻译学的必要性。1972—1992年间,国内外都是把翻译作为一种外语教学的方法在研究。在国外,1972年 Holmes 就提出,翻译教学有两种类型,一是指几个世纪里作为外语教学方法和外语习得测试手段来使用的翻译,一是指学校和课程里用来培养专业翻译人员的翻译教学,即译员培训。译员培训提出了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教学方法、测试技术和课程规划有关的问题。而在当时,这些问题至少是应用翻译研究的主要领域。有学者分别对加拿大、丹麦等国家的翻译教学进行描述,并肯定了翻译教学法对提高外语能力的重要性。在中国知网可检索到这20年间国内发表的约100篇翻译教学研究论文,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俄语翻译教学领域,讨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如何协调翻译教学和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

1.3.2 学科初始阶段的翻译教学研究 (1992—2002)

这十年间国外出版的翻译教学论文集比较多,基本开一次大会就会出版一本论文集。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顾问、*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杂志前主编、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 Cay Dollerup 和合作者编著了四本翻译教学论文集,综合了20世纪

80—90 年代英语学者在不同国家的翻译教学研究成果,促进了英语世界的翻译教学研究和交流。德国学者 Kussmaul (1995) 出版了《译者培训》(*Training the Translator*) 一书,通过有声思维法考察学生在翻译中的心理过程,指出提升翻译能力的策略,既有从功能角度对文本的语用和语义分析,也包括词典的使用、翻译的评估和错误分析等实际问题,为翻译培训机构教师和译员提供了很好的建议。

在中国,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期,一批学者如杨自俭、张南峰、许钧、王克非、张柏然、吕俊、潘文国、王宏印、刘士聪等深入探讨中国翻译学构建中的问题,为建立中国翻译学作出努力。这一时期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国外翻译研究丛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随着国外翻译理论的引进,大量学者深入阐述、分析各种翻译理论,为翻译教学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1996 年,首届全国翻译教学研讨会召开。这一时期国内翻译教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穆雷的《中国翻译教学研究》和张美芳的《中国英汉翻译教材研究(1949—1998)》,重点对翻译教学概况和翻译教材进行了基础性研究。还有一本论文集《论翻译教学》(刘宗和 2001)。另外,同期发表了翻译教学相关论文 500 多篇,以经验性的总结或教学实践思考为主。总体来看翻译教学研究缺乏系统性,描述性较强,创新性不足。学者们呼吁要加强翻译专业的学科地位,加强翻译理论研究和交流和对翻译教学的指导,强化翻译教师队伍建设,完善翻译课程设置,编写适用教材,改进教学方法,促进 21 世纪翻译人才的培养(何刚强 1997;穆雷 1997;罗选民 2002)。

1.3.3 学科发展阶段的翻译教学研究(2002—2012)

这十年翻译教学研究进入系统化阶段,国内外均出版了一系列专著。德国、西班牙、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学者出版英文专著,从不同视角研究翻译教学,如《翻译教学:从研究到课堂(教师手册)》(*Translation*

Teaching, from Research to the Classroom: A Handbook for Teachers)、《口译教育的基本建构：课程与测试》(*Fundamental Aspects of Interpreter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翻译培训师手册：反思性实践指南》(*A Handbook for Translator Trainers: A Guide to Reflective Practice*)、《口笔译训练的基本概念与模型》(*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这些专著从理论到实践，从研究到课堂，从基本概念和模式到课程设置，从口笔译培训须知到教师手册等，全面细致地勾画了口笔译培训和教育的方方面面。2003年出版的论文集《象牙塔之外：重思翻译教学》(*Beyond the Ivory Tower: Rethinking Translation Pedagogy*)展示了翻译教学与研究的新视角和新焦点，从社会建构主义教学法、TAPs 翻译过程研究和译者自我形象的提高等角度分享教学洞见。还有 Tennent (2005) 主编的论文集《新千年的培训：口笔译教学法》(*Training for the New Millennium: Pedagogies for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讨论了口笔译教学策略、翻译教学理念、翻译教学研究方法、译员培训与理论的关联、欧美主要国家的培训现状与未来等话题，对翻译专业建设具有借鉴意义。难能可贵的是，国际翻译学界一直在关注翻译教学研究成果的刊发和交流，《*The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er*》于2007年正式创刊，目前是国际翻译教学研究领域的高水平期刊，被收入 SSCI 和 A&HCI 索引。国际翻译学核心期刊 *Meta: Translators' Journal* 和 *Bab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也比较关注翻译教学研究成果。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翻译学者学科意识更强，翻译学科发展步伐更大。主要的标志是翻译学科在国家层面获得认可，学术活动广泛开展，翻译研究走向国际前沿（王克非 2019：819）。翻译教学研究走向专题化，出版的专著有《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翻译课程模式研究：以发展翻译能力为中心的方法》《口译理论与教学》《口译评估》《口译教学研究：理论与实践》《翻译教学与翻译能力发展》《中国高校英语专业本科翻译

教学研究》《本科翻译专业测试研究》《论中国翻译教材建设之理论重构》(*Translation Textbooks in China: A Theoretical Reconsideration on Their Making*)等。这些专著对翻译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课程模式、教材建设、测试与评估和学生翻译能力的培养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新世纪翻译教学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大大促进了翻译学科发展。

1.3.4 学科繁荣阶段的翻译教学研究(2012—2024)

国内外译学发展进入繁荣阶段,呈现出多元化、系统化的特点。这一时期出版的英语翻译教学论文集有四本值得一提。美国 Venuti (2017) 教授编著的《翻译教学: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教学法》(*Teaching Translation: Programs, Courses, Pedagogies*) 内容丰富,主要探讨了“文凭和学位教学”“翻译实践教学”“翻译理论”“历史和实践研究”“翻译教学法和教材研究”等主题。但该书对翻译人才培养的讨论不多,且未涵盖中国翻译教学及研究成果。鄢秀等人(Yan et al. 2018)合著的《口笔译培训研究:文献计量分析与学习者实证研究论文集》(*Research on Translator and Interpreter Training: A Collective Volume of Bibliometric Review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Learners*) 不仅较为全面地呈现了国际翻译教学研究现状,为翻译教学研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其中基于学习者个体的实证研究为翻译教学研究者提供了范例与研究方法借鉴。德国 Kiraly 教授和瑞士 Gary Massey 教授(2019)编著的《翻译教育中的真实性体验学习》(*Towards Authentic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Translator Education*) 着重介绍和重新审视口笔译教学中真实体验式学习的重要性,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翻译职业和学科应更加注重全球化能力和跨文化能力的培养。该书还激发了对学习效果的进一步探索性研究,激励在不同国家或课程中实行真实体验式学习(Xu & Tao 2023)。2022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两位学者出版的《劳特利奇在线笔译和口译教学指南》(*The Routledge Guide to Teaching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Online*)

提供了在线教学的多种方式：全部在线、部分在线、混合式、多模态或者包含在线教学部分的面对面教学。

这一时期翻译学科建设跨入一个崭新阶段，“国内的翻译研究迅速发展，逐渐形成两大取向，即接轨国际的研究和中国特色的研究”（王克非 2019：819）。在翻译教学领域，《我国翻译专业教材建设：理论构建与对策研究》（陶友兰 2013）、《翻译教学论》（王树槐 2013）、《本科翻译教学研究》（彭萍 2015）、《翻译教学法研究》（李庆云 2015）、《翻译教学的创新性与前瞻性体系研究》（周兴华 2017）等专著相继出版，体现了翻译教学研究逐步深入，顺应了时代和专业发展的要求。同时，还有三本翻译教学研究论文集出版——《翻译教学：需求分析与课程设置》《翻译学：口译理论和口译教育》和在施普林格出版的《重构翻译教育：中国翻译教育对全球的启示》（*Restructuring Translation Education: Implications from China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主要是学者个人研究论文的结集，呈现了中国学者在新时代对翻译教学的思考和探究。

1.4 翻译教学研究的特点

翻译从一种教学方法发展到一门专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间教学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上述主要翻译教学研究专著和论文集从不同角度探索了翻译教学的方方面面，很难对其作出统一的判断和评述，且大部分都有书评可以参照。但是研究论文具有一定的共性，笔者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通过检索关键词挑出了几百篇核心论文，并进行分类，发现翻译教学研究论文主要呈现出以下六个特点。

1) 翻译本科专业和翻译硕士专业研究更加完善，职业化特征越来越明显，注重翻译市场、翻译规范对翻译教学的导向。相关研究不仅关注就业情况的调查，同时也总结专业教育经验，从教学理念的阐述、课程模块

的设计和教学案例的分析等多个角度，为翻译人才培养提供参考（陶友兰 2017；姜倩、陶友兰 2018；张爱玲、丁宁 2019；张政、王贇 2020）。

2) 口译教学研究多元化，注重口译社会性、口译技术教学研究。国内学者在远程口译与口译教学新形式研究（黄立鹤、吴贇 2021；李笔豪等 2022）和口译技术教学研究（路玮、张威 2022）两方面较为关注，同时对学生口译能力发展路径，影响学生口译表现的因素，口译的社会性、非职业性研究以及口译教学创新与服务学习（王炎强 2024）也有所研究。国外学者注重职业实际与情景还原式的口译教学，与雇主期待或市场需求接轨，着眼于学生进入职场前的预备技能与工作能力、口译伦理、口译规范与用户期待、教师培训、口译职业面貌与发展（Álvarez-Álvarez & Arnáiz-Uzquiza 2017；Cuminatto *et al.* 2017；Rodríguez de Céspedes 2017）等研究主题。

3) 通过实证方法研究翻译教学的论文增多，教学方法研究不断丰富。研究者利用有声思维法、眼动追踪法、键盘记录法、录屏等方法来研究学习者的学习焦虑、策略、动机等（Yan *et al.* 2018；Angelone 2019），注重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Massey 基于合作涌现学习（co-emergent learning）理念，注重对翻译能力的研究，重视教师的能力培养和提升，尤其是教师的职业发展及其能动性研究（覃俐俐 2022）。

4) 翻译教学与课程思政、育人理念融合。《中国翻译》《中国外语》等期刊设置专栏阐述、总结我国高校翻译专业在思政教育上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并为翻译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实践探索案例以及前瞻性思考（司显柱 2021）。一线教师则注重研究口译课程思政教学（管玉华 2023；康志峰等 2023）和口译教材核心价值观构建等（戴朝晖 2022）。

5) 真实项目教学和机器翻译与译后编辑教学研究逐渐受到关注。真实项目问题导向的交互式学习促进学生形成更加灵活的决策机制。项目驱动教学法能促进翻译职业知识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形成。“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简称 PBL）是一种基于问题的学习理念，

主张用现实中的问题来驱动学习。在教学中应用 PBL 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主张，提升学生自主和合作学习的效率，提供学习所需的外部资源（李德超 2021）。在译后编辑教学中，应用动态评估很重要（王湘玲、沙璐 2021）。译文质量评估能力在译后编辑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还有学者探讨了译后编辑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评估（Guerberof-Arenas & Moorkens 2019），并基于教学设计或教学模式对不同学习阶段的学生开展了线上或线下译后编辑教学实证研究（Wang & Wang 2021），以培养学生的译后编辑实操技能、工具和技术能力、项目管理和团队合作等能力。

6) 语料库翻译教学研究和翻译技术教学研究日益成熟，相关研究与课程体系建设、教材编写和翻译人才培养交叉融合。具体的研究主题包括基于语料库翻译教学平台的设计和使用情况研究，基于语料库翻译教学模式、翻译课程的研究（赵政廷、柴明颀 2021），语料库在翻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王克非、秦洪武 2015）。研究发现在翻译教学中运用语料可以提升翻译学习效率和效果（Bilić 2020），有助于创建高质量的自主学习和发现式翻译教学环境。针对翻译技术教学实践存在的诸多问题，有研究者提出相应对策（王华树、李莹 2021）；或是对 MTI 翻译技术教学体系设计作出全面分析，提出如何培养学生的技术思维能力（He & Tao 2022），指出翻译技术应用能力的目标；也有研究者对中外翻译技术教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He *et al.* 2022；陶友兰 2023a）。

由上可以看出，中外翻译教学的历史比较悠久，严格意义上比较正式的高校翻译教学基本上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根据翻译教学的侧重点，可以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直觉教学逐渐转向对比教学，再到等效导向的教学、功能导向的教学和认知导向的教学。教师根据每个阶段具体的教学目标、教材、评估和学生的需求以及教师的素质，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从早期的个人经验和反思型教学，演变为结构主义教学法、建构主义教学法和整体法，体现了教学理念从经验主义、结构主义

到建构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转变。翻译教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也顺应翻译教学实践，展现了来自经验的启发、基于辩证的演绎法、实验归纳法、跨学科整合等特点（Tao *et al.* 2020），整体偏向人文主义，实证研究方法有待加强。整体看来，我们仍需要加强和重视翻译教学研究。本书接下来将从翻译研究内部六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